

从启蒙维新到尊孔复辟

康有为政治与文化
思想的演变

宋德华 著



岭南文化丛书

主编 左鹏军

文化
Culture and Art

从启蒙维新到尊孔复辟

康有为政治与文化
思想的演变

宋德华 著

岭南文化丛书

主编 左鹏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启蒙维新到尊孔复辟：康有为政治与文化思想的演变 /

宋德华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8

（岭南文化丛书 / 左鹏军主编）

ISBN 978-7-5039-6562-3

I . ①从… II . ①宋… III . ①康有为 (1858-1927) —思想评论 IV . ① B25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98323号

从启蒙维新到尊孔复辟

——康有为政治与文化思想的演变

著 者 宋德华

责任编辑 董良敏

书籍设计 赵 矗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caaph.com

电子邮箱 s@caaph.com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6 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28.5

字 数 445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16

书 号 ISBN 978-7-5039-6562-3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项目成果

总序

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人文学术虽然不是最受重视、最受关注的领域，却经常带有几分敏感而微妙的色彩。在许多情况下，人文学术领域的喜怒哀乐、晦明风雨，经常传递和反映着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乃至整个国家文化学术的升沉起伏、阴晴圆缺。作为中华文化整体格局中特色突出、个性鲜明、价值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态之一的岭南文化，也自是如此。

人文学术意义上的岭南文化不仅是一个区域性的物质文化概念，而且是一个具有形态学价值的精神文化概念，是岭南地区精神品质与文化内涵的概括表述。这种精神品质和文化内涵往往也是文化传统中最为深邃、最有价值、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对岭南文化精神品格的深层开掘，把握其内在特质的深刻与精微，正是文化研究的重要目标。岭南文化历史底蕴的探寻和确认，既是对岭南历史传统的回顾、体认和激活，也是使岭南文化这一概念不断获得学理价值和丰厚内涵的重要条件。

随着20世纪初以来现代意义上的世界观念、中国观念及其内部地域文化观念的逐步形成，“岭南”作为中国文化整体格局中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的观念得到迅速发展。“岭学”“粤学”“南学”等名称的提出和运用，就是这种地域文化意识崛起的重要标志。岭南文化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取得一批具有开创精神和奠基意义的成果之后，随着中国政治局势、思想文化的剧烈动荡、深刻变迁而经历了诸多坎坷曲折，其间留下了许多既令人难忘又使人难堪，既使人庆幸又令人痛苦的经验和教训。另一次比较兴盛的时期则要等到四十多年以后才出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新时期以来，包括岭南文化在内的地域文化研究的状态、处境和影响也总是与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传统的学术政治观念息息相关，从一个独特角度反映着当代中国的人文学术变迁。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在枯木逢春、百废待兴的文化氛围中，在学术界如饥似渴、争分夺秒的时代精神感召下，岭南文化研究曾出现过一次繁荣发展。

的机会，也产生了一批成果，其中有一些至今仍不失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并有可能取得一席学术史地位。随着其后发生的那次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学术的重大转向及其造成的深远影响，岭南文化研究逐渐失去了繁荣发展的动力，仿佛进入了一个有气无力、似断似续的冷落期或休眠期。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年左右，到新旧世纪之交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学术文化界在反思回顾、瞻望前瞻共生的语境下又一次兴起了对地域文化的关注，其中当然包括岭南文化研究，而且由于岭南地区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文化史上发挥的特殊作用和具有的独特地位，岭南文化研究仍然处于相当活跃、备受关注、颇有影响的状态之中。

在许多学术领域中，观念、立场与方法往往会产生根本性的作用，可能对整个学术活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岭南文化研究也不能例外。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思考并认真解决岭南文化研究中的基本观念问题，以图寻求和建立科学通达的文化立场，确立并运用恰当的研究方法，在学术追求与现实关怀两个维度上推进岭南文化研究的进展。基于这样的认识，以下一些关系就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一、乡邦情怀与通达视野

文化总是以具体的方式而不是以抽象的方式存在和呈现的。从根本上说，每一个人都是一定的具体的乡邦文化的产物和载体，其存在方式都是具体而独特的文化语境的反映。因此，当任何一个研究者进入任何一个文化研究领域时，其自身的独特性和具体性都必定会被带入其思维活动和学术活动当中，这是一种不可忽视也不必超越的必然。当带着这种特殊性或局限性进入自己所生存的文化语境的研究之中时，人人都具有的这种情愫就极易转化成一种强烈的以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为主要特征的乡邦情怀，并在其学术活动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

岭南文化研究亦自是如此。无论是否是岭南人，无论是否生长于岭南，也无论与岭南文化是何种关系，一旦将岭南文化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就首先需要一种乡邦情怀，一种了解之同情，一种文化家园意识，并生发出明显的内心体认和感同身受。这不仅仅是相关专业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态度、

一种思考方式。这是走近并走进岭南文化的情感基础和必要修养，也应当是进行岭南文化研究时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若无这种情感接近和内心体验，恐难真正进入岭南文化的深层体认，也难以把握岭南文化的精微之处，也就无法进入真正的学术意义上的岭南文化研究。

然而，只有这种乡邦情怀尚不能满足学术意义上的岭南文化研究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建立并获得的通达视野和开放心态也同样重要。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态度，而是岭南文化的变革历程和存在形态对研究者提出的学术与情感要求。岭南文化从来就不是一种自足独立的文化形态，尽管有着自己诸多的鲜明特性、区域特征，但它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中生存、发展与变革的一种区域文化，它的命运总是与整个中国文化的命运密切相关、息息相通。因此，不宜脱离与中华文化的深厚背景和深刻关联，过分强调岭南文化的某些个别性或特殊性。

因此，探究岭南文化的特质，必须以整个中华文化为背景，甚至应当具备一定的世界文化视野，以获得广阔的文化参照和深邃的文化情怀。因为自明清特别是近代以来，岭南已经与西方产生了愈来愈深刻的文化关联，这种关联后来逐渐扩展到整个中国。要把握岭南文化的形成过程、内部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只从其内部进行考察是无法解决全部问题的；还应当从其外部入手，如岭南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关系，乃至与中华文化、世界文化的关联，在联系比较中确定岭南文化的特质，准确认识岭南文化的精神品格。

在目前的岭南文化研究中，尤当强调通达视野与开放心态的建立，减少狭隘观念和封闭心态，避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和主观随意、缺乏学理性的做法。不可出于某种现实动机，轻易地将许多区域文化的共同性当作某一地区文化的独特性予以片面夸大，形成明显的非学术、伪科学的判断或似是而非的认识。学术研究中必须遵守的认识的科学性原则与结论的可靠性原则在岭南文化研究中也同样适用。

因此，如何在研究活动中恰当地处理身在“岭南之内”与“岭南以外”的关系，如何恰当地处理“自我”叙述与“他者”叙述的关系，将“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结合起来，并顺利实现它们之间的必要交叉和自由转换，对于岭南文化来说向来非常重要，而在当下尤其如此。

二、感性体悟与理性精神

与其他地域文化研究一样，岭南文化研究中同样需要确立恰当的学术角度和价值立场，以激活优良传统、融通历史与现实、整合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为途径，以创造新文化、寻求新发展的综合性文化建设理想为目标。既需要感性体悟，又需要理性精神，并力争实现二者的密切结合和自然交融。这是通过学术研究进而实现岭南文化传承与延续、转换与创造的应有的文化情怀和精神追求。

感性体悟主要是指岭南文化研究中的深入体验、深切感受、自觉融入，其体验方式主要表现为在具体的学术活动和文化生活中保持一种热诚参与的情绪、真挚火热的激情，和由此带来的发自内心深处的对于岭南文化的感动。这种感性体悟看似自由随意，有时甚至显得有些虚无缥缈，实际上却往往是基于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而生发的对于一种具体文化形式的感知与亲近。这种妙手偶得式的内心感受和情绪体验对于学术研究来说相当重要，不可或缺。

同样重要的是理性精神。这主要是强调在岭南文化研究中要保持清醒客观、严肃冷峻的态度，保持激浊扬清、自由超越的批判意识，进而确立独立与超然的学术立场和以人文精神与现代意识为主体的文化品格。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学术活动和文化体验中始终清醒地认识和分辨岭南文化的优点与缺点、成就与不足、精华与糟粕，对研究对象采取基于理性分析与学术判断的通变、扬弃的自由立场，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激浊扬清的文化观念和以当代人文精神为主体的主体意识。这种学术立场和精神品质在岭南文化研究中异常重要。一方面需要深入体验、深切感受、自觉融入，需要热诚、激情与感动；另一方面需要保持清醒、冷静和理性，保持必要的自由立场和超然态度。这是实现岭南文化传承与延续、转换与创造的应有的文化情怀。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感性体悟和理性精神不唯不相矛盾，且相辅相成。二者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赋予岭南文化研究以生机与活力，共同构成了岭南文化研究的双翼。它们映衬着对方，彰显着对方，造就了对对方，也成就了自己，完善了自己。在具体的岭南文化研究中，能否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将它们密切结合起来，实现它们之间的自然交融和适时转换，是衡量研究水平和学术境界的重要标志。

从目前岭南文化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更应当加强基于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的文化批判意识，因为这是岭南文化研究界多年来明显缺乏的。某些研究者或出于乡土深情和狭隘之见，或出于思维定势和学术习惯，对岭南文化采取的态度有轻易认同和过多肯定的倾向，缺少了本应具有的清醒的分辨能力、冷峻的批判意识和超然物外的独立情怀，而对岭南文化中某些明显的局限性、某些精神缺失也未能采取理性分析、学理批判的态度。这不仅明显限制了岭南文化研究的进展和深度，也大大影响了岭南文化精神传统的深入分析和现代建构。这种情况如不能被清醒认识并得到尽快改变，必将愈来愈深刻地影响岭南文化研究的进展和现代岭南文化精神的建构。

扩大一点范围来看，在以往和当下的许多区域文化研究中，经常不同程度地存在格局狭小、态度轻率、赞之过多、誉之失当的倾向，往往缺少原本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文化批判意识、科学分析、理性思考精神。实际上，理性精神和批判意识的缺失，既影响对文化局限性的清醒认识，又会影响全局性的学术判断，也就不可能真正发现和认识优秀的文化精神，必然极大地限制地域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平和思想深度。

三、经济优先与文化本位

新时期以来，作为国家改革开放战略的试验区和最前沿，以广东为主体的岭南地区获得了跨越式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优势和示范价值，但同时也产生或暴露出一些颇为紧迫的深层次社会文化问题。岭南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必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的高度去探寻如何在新环境、新要求、新目标下保证岭南地区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岭南文化研究应当是在反思历史、认识现实和规划未来的高度上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举措。

当下的岭南文化研究是新时期以来岭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带有文化反思意味的回顾。既是对岭南文化传统的学术清理，又是对岭南文化现状的价值重估，也是具有文化自觉意味的对其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思考和前瞻，重要的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寻找岭南文化研究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最深厚的人文价值。如何实现历史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换，使深厚的文化

积累成为现代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精神动力；如何在现实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中保持已有的个性特色，使岭南走上健康和谐的综合发展之路，都是岭南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如何保持岭南文化研究的“学术”品质和“文化”本位，就显得非常关键，有必要特别强调。岭南文化研究应当始终坚持以追求真理性为特征的学术品质和以追求崇高精神为旨趣的文化本位，不可以因为其他任何因素、任何目的冲淡或消解这种根本性的精神追求。有必要指出，一些颇为流行的似是而非的观念对以学术理念和文化本位为基点的岭南文化研究造成了不良影响。多年来时有所闻的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说即其一例。这种论调看似既重视文化也重视经济，实则是将“文化”永远置于“经济”的脚下，“文化”的根本性价值被瓦解和否定，而经常被作为一种装饰或点缀，落入任人打扮、随意驱使的境地。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仅颠倒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而且必然使文化研究和建设陷于日益艰难、最终受到影响的，是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这种由于非学术、非文化因素影响而明显有意冲淡和消解文化根本性地位与核心价值的观念与做法必须引起警觉并尽快改变。

四、即时效应与恒久价值

许多学术研究领域都有可能面临即时效应与恒久价值及二者的关系问题，许多研究者也经常碰到这种困惑。对即时效应和恒久价值之长短优劣做出清醒的认识并处理好二者间的关系，实现二者的统筹兼顾和适当转换，对岭南文化研究同样非常重要。多年来的岭南文化研究存在着过多强调时效性、现实性，而对更加重要的恒久性价值注意不够、认识不足。近年来，随着国家的全面发展与其他地区经济、文化的迅速崛起，岭南原有的得风气之先的优越性与优越感已如明日黄花。这种过多顾及眼前利益、即时效应而缺少应有的前瞻性、预见性而带来的问题已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

文化研究的时效性较容易被认可，其重要性也似乎更容易被认识，特别是在以商业文化、利益导向为基础的社会环境和价值观念中更容易被认为合理、自然；其实通常较难被认识到、被广泛接受的长久性、可持续性价值才更加重要。比较理想的局面是在文化研究中将时效性与恒久性结合起来，从长久性着

眼，从时效性入手，打通二者兼容互补、自由转换的通道，实现即时性与长久性的对接与双赢。因为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和建设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往往需要长时间的沉潜努力才有可能取得有恒久价值的成果；更不可急功近利，不可急躁求成，过于强调时效性必然伤害长久性的追求，也必然给学术研究造成根本性的伤害。

当下的岭南文化研究尤应注意寻求数量与质量、时效性与长久性、基础性与应用性、学术性与社会性的结合点，使它们有效地统一起来，保持岭南文化研究的持久活力与学术品格。从长远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战略的角度探寻和认识岭南文化研究的学理价值与当代意义，这是岭南文化及其研究获得历久弥新的生命力的重要保障。基于这样的认识，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上思考和认识岭南文化的内涵及其意义，寻求岭南文化的历史底蕴与现实机缘的结合点，培育岭南文化的历史感和生命力，就显得非常必要。

近年来，时常可见因为过分关注即时效应或某种现实需要而忽略学理根据、忽视长久价值的观点或主张。这种假学术之名行非学术之实、以学术之法毁学术之理的做法极不可取。在岭南文化及相关领域中时常可见的那些违背常规常理的主观随意的突发奇想、一厢情愿经常会使学术研究受到直接损失，而那些无视客观现实、缺乏学理根据的大言欺世、哗众取宠和沽名钓誉，其危害又岂仅学术而已？

五、各施所长与融通互补

与中国文化中的其他区域文化一样，岭南文化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体系；而且，愈是充分认识岭南文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就愈有可能对其做出接近事实本相的研究和估价。因此，岭南文化研究必然涉及多个学术领域和学科门类，远非某一学科、某一机构、某些个人或团体所能完全胜任、包打天下，而需要众多学科、众多领域研究者的各施所长和融通互补，共同营造并保持岭南文化研究的良好局面和广阔前景。

这就首先要求研究者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根据自己的学科特点和学术习惯，充分发挥学术优长，各展个性优势，各显才华智慧，坚持独立的学术思考与自主的研究理路，秉持学术的本心，把握岭南文化的精髓，深入认识岭南文

化与其他地域文化、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在宽广的学术平台上开展具有学术理想、具有广阔前途的岭南文化研究。多年来，岭南文化研究在历史学、方志学、哲学、文学、文献学、方言学、民俗学、地理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做的工作较多，成绩也较为突出。除此以外，仍有广阔的学术空间有待开拓，多个学科门类需要加强，特别是弥补薄弱环节和填补空白领域，重视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开发与建设，保持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的协调发展。

实际上，学术界对岭南文化及其研究的理论思考和学术反思从未停止过，随着学术与时代的发展，这种回顾和探索必须不断深入，为相关研究提供足够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支持。近期有学者正式提出并进行较全面论述的“岭南学”概念，就是一种具有建设性和前瞻性的学术努力。这种努力所追求的，就是以以往的岭南文化研究为起点，以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参照，并借鉴其他相关领域或学科的建设情况，着眼于当下建设与未来发展，全面提升岭南文化的研究水平，使之走上规范化、学科化的道路。这种努力反映了岭南文化的历史积累、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对学术界提出的必然要求，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启示价值。有关研究者和学术文化部门应当承担起这种既有学术性又有普及性，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的文化责任。

岭南文化研究是一项历史与现实相融通的综合性学术建设和文化建设工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众多研究者的合理分工、通力合作、共同努力，也需要社会文化各界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支持。应当特别加强总体规划与综合部署，加强学术界的深度合作，集中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机构的学术优势，弥补个体化、单一化的学术方式带来的局限性，真正促进岭南文化研究保持高水平的持续发展，使岭南文化研究保持深度与广度、具体性与全面性、学理性与实用性的统一。

就目前的岭南文化研究而言，除当注意一般意义上的基础建设、人才培养、学科交叉互补、学术机构的协作联合之外，尤当强调岭南地区的研究者与国内其他地域文化圈的有关研究者（特别是与岭南地缘接近、与岭南文化关系较为直接的研究者）的交流与合作，与境外相关领域研究者的交流与合作。香港、澳门虽同属岭南文化区域，但由于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因素，其文化形态与学术习惯有明显的特殊性，有必要特别强调内地学者与港澳学术界的交流与合

作，共同促进岭南文化研究的进展。台湾虽不能划入一般所说的岭南区域，但从历史上看，它与岭南文化的渊源非常深刻，可以说文化精神血脉相连。因此，内地的岭南文化研究者有必要加强与台湾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岭南文化研究的进展。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在当下及今后，只有学术界的分工互补、共同努力，才有可能迎来岭南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取得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绩。

总之，作为一种具有深厚历史传统、旺盛现实生命力和广阔未来前景的区域文化，岭南文化必然是渊深博大的；岭南文化及其个性品质、精神内涵也应当是开放变革、丰富发展的。因此，岭南文化研究就应当是一个不断适应时代文化建设需求，不断追求学理性、科学性、真理性的学术过程。清楚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一点，追求岭南文化研究愈来愈广阔的学术空间、愈来愈高远的自由境界，是保持其旺盛生命力和恒久价值的重要条件。

在现代学术语境中成长进步、在世界文化背景下发展壮大的岭南文化研究，已经具有了一个多世纪的积累和经验。作为承前启后的研究者，既需要秉持以守正创新为基础、以追求超越发展为目的的学术立场，又需要怀有以人文精神为内核、以文明进步为理想的现实情怀。二者的有机结合、相互激发，方有可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思想果实。

岭南文化研究是华南师范大学的学术传统和研究特色之一，早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就有多位学者从事岭南文献、文学、语言、历史、地理、方志、民俗等方面的研究。这一传统在艰难曲折的50年代至60年代以及热情洋溢的80年代以来的学者们身上得到传承和发扬。1986年成立了“华南师范大学岭南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促进了岭南文化研究的进展和多学科专业人才的培养。2005年，经广东省教育厅批准，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为岭南文化研究提供了更新更高的平台，努力将岭南文化研究提高到新水平。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薪火相传，华南师范大学的岭南文化研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特色和学术优势。2013年，在“创新强校”背景下，学校又成立了“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传承发展与全媒体传播交叉学科创新平台”，继续开展多种形式的岭南文化研究。这套《岭南文化丛书》就是该平台组织策划的重要成果之一。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为岭南文化研究略尽绵薄之力，更希望与海内

外同道切磋交流、取长补短，共同促进岭南文化及相关领域的学术进展。

岭南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岭南文化千姿百态，色彩斑斓；岭南文化的思想内涵在多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得到迸发呈现；岭南文化的精神品质在众多历史人物的道德功业文章中得到充分彰显。新视野、新追求、新目标之下的岭南文化研究庄严而艰巨，任重而道远。岭南学术界、文化界有责任首先担当起这一业在当今、功在后世的学术任务和时代使命，海内外同道是岭南文化研究的重要力量。我们愿意与海内外研究者一道，继续为更加高远的学术理想和精神目标而努力，去创造和迎接更加灿烂的学术春天。

左鹏军

乙未十月十八日于五羊城

导论：一位独特的先行者

从鸦片战争算起的中国近代，是一个由古代君主专制社会逐渐向近世民主社会转型的时代。这一时代由多个各具特点的历史时期所构成，而每个时期都会出现最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在戊戌变法前后这一时期，作为改革思想家的康有为，就是这样一位以启蒙和维新引领时代的代表人物。

所谓启蒙，对于当时中国来说，特指对正统专制主义思想体系的突破和更新。道咸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潮，初现启蒙端倪；继之而起的洋务和早期改良思潮，从诸多方面拓展了启蒙的内涵。然而，真正启蒙的标志，要到康有为撰写《人类公理》等著作，创立新的思想体系之时，才开始出现。启蒙的直接结果，是维新变法思潮的涌动。康有为以《上清帝第一书》，拉开了士人请求朝廷变革的大幕，随后通过聚众讲学、批伪经言改制、连续上书和多种“变于下”的活动，使启蒙维新思想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正是有赖康有为这位敢于颠覆旧学，建立新学，着力鼓吹大变、全变、速变的先行者，传统纲常论的一统天下才得以打破，维新阵营才得以大规模聚集，变法也才得以深入改革专制政治制度的层面。无所畏惧地充当呼唤、推动和引领戊戌变法出台的思想领袖，可以说是康有为最大的历史贡献。

戊戌政变后，面对后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出逃海外的康有为并未消沉屈服，迅即将“君权变法”转换为“保救光绪”的斗争。虽然求助于外国毫无结果，但他在华侨中却通过成立保皇会而站稳了脚跟。在此过程中，他大力歌颂光绪帝和维新派的变法业绩，抨击慈禧和后党政府的守旧罪行，号召华侨忠君爱国和合群救亡，显示了即使身处困境，也要将维新大业进行到底的决心。当义和团运动高涨，八国联军入侵镇压，清廷危机重重之际，他乘势全力筹划勤王起义，欲凭借外国支持，以武力推翻后党政府，扶持光绪帝复位和新党掌权，实行全面仿效西方的改革。再度失败之后，针对张之洞的“劝诫”，他竭力为新党辩护，前所未有地公开宣扬个人自主、平等自由、反抗专制、流血革

命等主张，甚至明显流露出划清华夷之别的民族主义倾向，构成启蒙维新核心的民权思想至此达到高峰。

一路先行的同时，受时代条件所制约，康有为身上也存在明显的弱点。首先，其启蒙偏重于抽象的理想。他对人类公理的信仰，源于中国贫弱危亡现实的刺激和西方所传民主理念的引导。但当时他既未出国门，也甚少读到西方人的启蒙著作，所论公理大多来自想象和推测，虽足以别开生面，超前领先，却学理基础薄弱，现实呼应空泛，可以成为未来的美好向往，却难以直接转换成思想斗争的武器。其次，其维新对君权依赖性过大。改革之初，选择“君权变法”本来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他明知君主无权还不早作他图，当君主被囚仍深恋不舍，因君主尚在便矢志效忠，死守知恩图报的旧德，空盼毫无可能的君主复位，这就使其尽管一时仍具除旧开新的锐气，却难免程度有限，不能一直跟随变革潮流而前进。再次，不愿脱离孔学而独立。他将自己的新思想与孔学相结合，斥伪经而言改制，其意义本在于借用孔子的权威，改变经学的旧貌，突破专制守旧思想的束缚，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对孔子和孔学的依附。他用新的诠释为孔学添加了民主思想的内容，但又总是以孔学的话语解读新的观念，这就使新思想的生长备受限制，难以取得突破性的发展。最后，过多寄望于外国支持。要实现中国近代的变革，尽量寻求或利用外国的帮助本无可厚非，但必须以自身力量为立足点，并客观理性地分析这些帮助的可能性。在此方面，他恰恰常抱主观臆想，甚至将自身成功建立在外国支持的基础之上，这就难免饱尝失望的苦果。这些弱点，共同凝聚成作为康有为思想根本特征的保守性和空想性，并在此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从辛丑到辛亥，康有为逐渐跟不上不断前进的时代潮流，与此前一路先行相比，可谓处于进取与保守、务实与空想交织参半的状态。在表现形式上，他未能从保皇自立的挫败中幡然醒悟，改弦易辙，另谋新的出路，而是返回戊戌前后的原点，以自我完善的方式期待重新再来。他撰写了《大同书》，将纲要式的“人类公理”，扩充成了体系化具体化的鸿篇巨制；完成了《论语注》《孟子微》《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演孔之作，了却了已开其端的“发明孔学”的心愿；续著了《官制议》，对戊戌年间重要的改革主张做了长篇大论的阐发；推出了《法兰西游记》《意大利游记》《物质救国论》等新作，以亲身见闻对究竟应如何认识和学习西方进行了反思；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政见，实现

了从君权变法到君主立宪的转变。在实质内容上，其进取务实与保守空想两方面都显得非常突出。就未来理想而言，他一方面绘制了一幅空前宏伟壮观、寄托人类美好希望的蓝图，另一方面却用主观烦琐的“三世进化”论，将此蓝图的实现推延到不可知的将来。就演孔而言，他一方面尽可能地推动了孔学向近代新学的转化，另一方面却沿袭扩大其弊，使孔学的神圣独尊更加固化。就学西方而言，他一方面对真实的西方有了更多了解，加强了取鉴的针对性，另一方面却基于保守的政治立场，将学其物质视为根本。就现实政见而言，他一方面顺应了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改革，另一方面却坚决反对反清民主革命，始终不愿放弃对君主和朝廷的幻想。此后，随着时势的继续演变，其进取务实的一面日渐萎缩，而保守空想的一面越来越占上风。

辛亥革命爆发时，对清朝土崩瓦解始料不及的康有为，急忙将君主立宪改换成虚君共和论，企图在承认共和的前提下，仍然保留君主的存在。迨至清帝退位，他才不得已地诀别虚君，并一度以相当积极的态度提出了共和建设论，可惜未能持续，很快就被救危论所取代。他清醒地看到了民国成立后所出现的乱危之象，但做了过度的夸张渲染；其矛头虽然也指向争权夺利的军阀，主要目的却在于要证明民主革命的危害性；其救危的理论和方案尽管不是毫无合理之处，但最为明显的还是其保守性和空想性。与政治上主张救危相一致，他在思想文化上极力宣扬孔教至尊论。为此，他襄赞孔教会的重建，将孔学誉为“国魂”，呼吁定为“国教”，号召祭天祀孔，坚守诵孔读经，尊孔完全成了其守旧抗新的工具。

当袁世凯出卖国权、独裁称帝之际，康有为对军阀政权希望落空、幻想破灭，转而走上了反袁之路。他先是痛斥“二十一条”，接着撰写了很有战斗力的《讨袁世凯檄》，声讨袁镇压革命派、蓄意以专制颠覆民主共和的罪行，指斥袁氏一心称帝是民国危乱的根源，申言民主共和与袁氏称帝势不两立，因激于时变而焕发的民主精神灿然可见。可是，这种灵光闪现只是其反袁的一个侧面，更重要的是，他从袁氏称帝中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必须强化民主共和，而是应该改变民主共和，此前一度放弃的虚君共和主张又得以复活，并迅速向复辟论转变。

虚君共和论转变为复辟论，是康有为与军阀张勋结成思想和政治同盟的结果。康有为是张勋复辟最早的策动者，袁死后，康、张二人很快建立起紧密